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亮节高风

| 方人定小传 |

FANG RENDING XIAO ZHUAN

陈继春 著



美術出版社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亮节高风

| 方人定小传 |

FANG REN DING XIAO ZHUAN

陈继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亮节高风：方人定小传 / 陈继春著. — 广州：岭南
美术出版社，2015.8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ISBN 978-7-5362-5491-6

I. ①亮… II. ①陈… III. ①方人定(1901~1975)—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3615号

责任编辑：李颖 王效云 杨靖 周章胜

责任技编：罗文轩 谢芸

装帧设计：杨易欣

亮节高风：方人定小传

LIANGJIE GAOFENG FANG RENDING XIAOZHUAN

出版、总发行：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51004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9.75

ISBN 978-7-5362-5491-6

定 价：48.00元

编委会

主 任	顾作义			
副主任	程 扬	吴伟鹏		
主 编	李劲堃			
副主编	许永波	李健军	熊育群	李清泉
编 委	刘金华	王 永	李若晴	陈 迹
	王 艾	戴 和	谢海宁	李 颖

序

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与“新国画”运动密不可分。发端于广东的岭南画派在这场“新国画”运动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以革命性、创新性的新思路，折衷中外、融汇古今，注重现实关怀、题材开拓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开启中国现代绘画的新风气，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

继“二高一陈”后，以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杨善深等为代表的艺术家，更是把岭南画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卓有成效地拓展了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使岭南地区迅速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基地之一，培养了许多影响21世纪中国美术进程的画家。他们继承和延续岭南画派的艺术精神，践行着创新和发展的道路，使广东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与创作的重镇。

在对广东美术发展史的研究中，岭南画派一直是被关注的，但系统完整的广东现当代画家传记著述却较少见到。梳理这些画家的人生经历，再现他们的探索过程，总结他们的创作思想，对于推动广东美术创新发展，增强广东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编辑出版《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丛书。

丛书根据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力甄选了20多位现当代画家作为传主，以文学性的叙事方式讲述艺术家活动及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使读者重回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岁月。丛书遵循从史到论，论从史出，通过文学家的艺术剪裁，注重围绕史料开展研究，力求科学严谨地再现各位传主的生平经历、创作历程、学术贡献和历史影响。丛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大量由家属提供和从档案中查阅到的第一手资料更为珍贵。

对岭南近现代画家的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是广东地域美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丛书的出版将极大地丰富画家档案及文献资料，为广东画家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更好地促进广东美术繁荣发展。

| 方人定小传 |

目录

001	一 / 追梦时代
016	二 / 学艺东瀛
035	三 / 鹊起羊城
067	四 / 海角栖迟
097	五 / 焕发新风
124	六 / 高风亮节
135	七 / 余言
138	附 / 艺术年表

一/ 追梦时代

方人定(1901—1975)是岭南画派中有突出成就的人物画家、理论家和书法家。学界相信,他“作为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开拓者之一,岭南画派重要代表之一,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深的理论,在中国画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1]

方人定于1901年6月19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四)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隆都大同乡濠涌村,临岐江之滨,有公路、河道。往南可通澳门及香港,往北可直达广州,交通便利。该处环境秀丽而且土地肥沃。相传此乡方氏先辈方道盛为宋朝度宗赵禔(1265—1274年在位)的驸马,夫人是宋度宗长女信安公主。南宋末年为躲避战乱举家往南逃难,先至福建莆田,后经广东珠玑巷至新会平康里,又转到开平茅岗,其孙方鸣岐一家从开平迁到香山“谷都”(三乡)平岚。至四世孙方印生,迁“龙眼都”(龙都)濠涌乡(大同、敦陶)定居,子孙繁衍昌盛。

近代以来,旧金山的发现,以及欧美、南洋、澳洲各国急需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穷苦人民得此机会,纷纷出洋做工。香山人受海外淘金浪潮的影响,也相继出国。19世纪下半叶以后,濠涌居民三分之二为海外华侨,余下的三分之一于乡务农,乡民除海外侨汇收入之外,务农者收入亦丰厚,这里是典型的“华侨之乡”。香山的华侨同时在家乡投资、捐赠、汇款赡养家眷的做法,有效地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家乡的社会面貌,教育也普及,青年学子出外求学者甚众。

方人定祖父焕贤,妻王氏;父名德,字伟堂,母郑氏。其祖父与父亲经营广东内河航业和米业,拥有一艘来往石岐与佛山之间的船,乐善好施。方伟堂被乡人称之为“佛山德”。焕贤公于1907年以82岁高龄谢世,所经营的商业亦因此而结束,方伟堂因此而失业赋闲在乡。

[1] 杨树:《〈方人定纪念文集〉首发式上的讲话》,广州,2011年6月15日。

方人定长兄炎彬、二兄宏滔、三兄引提、五弟五兆、六弟六行，人定排行第四，乳名仕钦。童年的方人定基本上过着和其他农村孩子一样的生活：下田、放牛、砍柴，他的小腿上后来还留有一个打柴时砍伤的疤痕。由于濠涌乡面临岐江，江深水润，波平如镜，乡中熟水性者多。方人定几乎每日黄昏都到江中游泳，幼年时已熟习各种泳式，被称为“儿童中的游泳健将”。宣统元年（1909），8岁的方人定在父亲的指导下课读于家。其弟后来记述云：“人定自幼好涂好画，好看自己住宅门前远山近景及农民动作形态，好似大自然激发了他的灵感，每天习书法之后，执笔绘出了山水画及农民不同形象风格，他觉得甚有兴趣，甚为得意，从此好绘画起来。”当地名宿极为赞叹！

1910年夏天，县城的文学及书法家方松洲访方伟堂于濠涌，谈话中见方人定的书法习作与所绘之画，曰：“此小孩极聪明，有天赋，如有良师加以指导，将来必成‘三绝’之才也！”方人定的聪慧亦被兄长们赞赏，他们深信方人定富有才华，将来必有大的成就，故不惜钱财去栽培他。在大哥的主张下，性情沉默的方人定于9岁进入乡中的“学瀛学塾”，每课必深入了解。尽管其父母俱信仰佛教，方人定却经常对父母说：“人能通理，人亦佛也！又何须求佛？”由此可见，方人定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幼年已显出过人的自信。

香山多稻田，可是方人定家从来没有置田，从事小贩业的父亲方伟堂逝于1914年39岁的壮龄，遗下6个幼小的儿子，此变故使方家陷入拮据的生活环境之中。母亲艰难地带着他们兄弟过日子，长兄、二哥及三哥支撑家中生活的同时，也负担方人定、五弟、六弟的教育经费。方氏兄弟亦甚懂事，品行俱佳。

父亲逝后三个月，方人定转读于乡中的“鸿宾学塾”，一年后春天入乡中“智新小学”。由于他曾于学塾读过数年，故学业不错。同时，为了静心读书及绘画，方人定亦搬至校内的小阁楼寄宿。假期及课余用心临习画作，晚上读书。小学时

期的方人定甚有才华，其同里、同族、同塾及同小学的友人方民希云：“小学设有乐队，每于庆典及出外巡行，必有乐队助兴。人定担任打小鼓，不须十分训练，打起来对节拍与音之疏密、强弱甚合音律。在合奏时甚为可听，称为能手，可知其天才之横溢。”

由于家境穷困，方家曾有三年没有打开家门购买沿街售卖的鱼与肉。后来，方人定的姑姑下嫁邻村溪角杨氏，姑丈以华工的身份赴美国谋生，在姑母的帮助下，长兄在16岁时前去美国，后来，二哥及三哥均先后到美国谋生。方家三兄弟初期在农场勤力工作，供养母亲及留在乡间的弟弟，长兄后来当了电焊工，而二哥一直在农场工作。由于三哥略识字，更在美国旧金山开设了一间杂货铺，于是家中经济状况渐好。也由于侨汇的关系，家境渐见丰裕。

1916年，15岁的方人定就读于县城石岐镇的“粹存国学馆”。该馆是当地最高的国学馆，分高级和初级两班，方氏就读的高级班，同学中有方民希及方鹏发等。散文、骈文、诗学、词学、《左传》、《孟子》等为专修科目，内容比之于乡间所学的尤广。方氏寄宿于馆内，每逢星期日或假期回乡探母或写画。其后，方人定于1918年考入香山县立师范学校。该校其时已有两届的毕业生，方氏为第三届的一员，而且寄宿于校。可是上课不久，因为校长的更替问题发生学生罢课风潮，方人定不得已回乡，至新校长上任后才继续学业。由于罢课风潮平息以后，不少学生退学，校方于是将所留下的二十多人改为“师范讲习班”，学制亦改为一年制。对于方氏此时期的行状，与之由小学至师范均为同学的方鹏发云：

他不是出身于富家豪门，性情不趋炎附热，亦不好社交。他常见投闲置散之青年，抛弃大好时光，亦深为之叹息。他待人接物甚为谦虚、礼让，如同学有困难时，亦诚心帮助，所以同学皆乐与他为友。学校一般同学对于学科成绩分数多

少及学期考试榜上名列前后等等，都极力竞争，务求达第一以为荣耀，但人定对此种竞争，皆不重视，是以人定非好名好利者。^[1]

正如人们所知，1919年“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诉求，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方人定在香山亦有参与，还著文数篇，阐述己见，并发表于《香山县学生联合会月刊》。此举标志着方人定对现实关注的转变，与其在香山县立师范学校“师范讲习班”经正式考试毕业后前往广州就学有一定的关联。

1920年1月至6月间，方人定入读于广州府学东街的“罗馥生国学馆”。很可能，方氏没有从事教育工作而离香山前去广州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能力，为将来打基础。正如我们所知，他由小学至师范，又或是在“罗馥生国学馆”时仍以“方仕钦”为学名，当年7月，取荀子“人定胜天”之意，把原名“仕钦”（四钦）改为“人定”，而且于1921年考入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法科。

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提学使于式梅联名奏请将课吏馆改为广东法政学堂。该学堂专门请了日本教习来讲课，选用日本的课本。1909年，广东法政学堂新校舍建于广州现在的法政右巷一带，法政路因此得名。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年，广东法政学堂改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分设学制4年的法律和政治经济两科，成为正规的大学。方人定后来的朋友、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1894—1983）曾云方人定青年时沉迷于辞章之学，“五四”以后，知辞章无用，这或可表明方氏习法律的原因之一。这和方氏早年对于乡中祖宅右邻被恶霸侵占一尺之地，而且屡争未得解决时，曾向父母表示“此区区寸土，何必力争，待学业有成就，这是很好的基业”的看法有很大区别。另外，“昔时乡塾学生年龄不一样，若老师在馆内，学生不免因小事发生争执，在此情形人定能为同学分析是非”。正因

[1] 参看方伍兆《方人定画家年谱》，美国，1976年初稿，未刊稿。

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时的方人定



为如此，大概我们不会惊讶于方人定的入学试名列第一的结果，异于当年不争排名榜的举动！

方人定寄宿于学校宿舍，读于“庚班”，同班同学中有自美国回广州读法政的杨邈父等。1923年8月，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改为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后来被并入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今中山大学法学院前身。翌年6月，方人定毕业。杨氏称：

人定好绘画，孜孜不倦，甚为用功，日常生活以绘画为第一，学校功课放之第二位，所以其绘画书籍及画纸多于法学书本。他的国学根柢甚好，入学试名列前茅，但入学校对于法学则不及我用功。他毕业成绩不及我。

方人定曾云：“初，未尝不欲致力研究政治法律，然终觉法律政治学，对于予的心境，无丝毫慰藉，乃于课余之暇，辄取旧藏于历代古画临摹，四五年中未尝间断。然又觉此不过古人宝贝耳，非予所应终日模拟。”其时，方人定在美国的兄长敦促其去美国深造，但由于他在习法律的同时仍于课余习画，若是前往美国，就不可能两者兼得了，故打消了去美国的念头，而且于1925年夏天在亲友的支持下又考入由孙中山先生（1866—1925）任名誉校长的广东法官学校高等研究部。该校为当时全国最高法学院，分为研究部、专门部两部，是训练司法专才，从事革新司法制度，以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而准备人才的教育机构。前者是法政，如果刚毕业即投考，一年半毕业。而专门部的招生对象是相当程度者，三年毕业。

方人定对绘画所产生的兴趣来自私塾时期，而且于16岁开始专心临习家中所藏的书画，而在读法律的同时，假期或课余都有到郊外写生或在校内临摹绘画。

1. 结缘“春睡”

熟悉广东美术史的人都知道，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政务委员许崇清向省署提出，建议举行全省美展。1921年，高剑父（1879—1951）受聘主理广州举行的全省美术展览会，其后任筹备处处长。12月20日，展览会于文德路广东图书馆开幕，高氏任副会长。时任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是次展览会会长陈炯明（1878—1933）亲临剪彩。展览持续至翌年1月20日，开幕日各筹备委员更为此拍照留念。展览中的绘画部分以中国画为多，以旧派画占多数，西洋画只占十分之一。此展览甫一开始，备受重视，盛况空前，以高剑父、陈树人（1883—1948）、高奇峰（1889—1933）为代表的“折衷派”新派艺术在展览会上崭露头角。

高剑父，名嵩，早年名麟，字爵亭（爵庭）、苟亭，号剑父、昆仑老农。高剑父由高祉元介绍拜入花鸟画家居廉门下时年仅14岁，之后东渡日本游学，1908年由日本返国。他在作品中所尝试采用的“融合中西”的形式，有别于传统国画，被称为“新国画”。在革命工作方面，他的名字于1908年在同盟会香港分会的登记册出现。1909年2月，受香港分会的委派，与潘达微（1881—1929）及徐宗汉（1876—1944）在广州设立分机关，参与革命活动。高氏于1920年年底出任广东工艺局局长，并且出任“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校长。1921年，高剑父在高第街素波巷租下一小楼，楼上有两室，命其一为“怀楼”，与高奇峰对门而居，闭门作画。一年后，高剑父迁居府学东街（今文明路安定里），并以此作为创作和授画的地方，向后来者推广其艺术主张。其后，高氏将画室迁往大东门，同时更接纳黄兴（1874—1916）的建议，以诸葛亮“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之意，取名为“春睡别院”，后改“春睡画院”。

方人定于1923年以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生的身份拜高剑父为师。高剑

父所创办的画院是近于私塾性质的，不能和正式立案的学院相比，收费极廉而且不公开招生，用传统的带徒弟的方式教授。正因为是师徒制，拜师礼是存在的，方人定入门时就以美国黄金币向老师奉呈，当时美国黄金币在中国是宝贵的通货，胜于白银，又多又重。据杨荫芳（1902—1990）说，拜师礼高达“四个大金”。方氏如何拜门？又于何处上课？

方人定于1935年的《自述》云：“幸于民国十二年春，得与予属忘年交的好友许翥先生之介绍，学画于高剑父先生之门。由是每日必在高先生的画室学习。”许翥是谁？他们如何结交？迄今没有详细的材料可以论述，但可知的是许翥（又名蛰辰、直辰，字翥）是香山南朗洋沙人，系美国檀香山华侨，在当地创办“直辰学校”，自任校长，就读者甚众。其工诗，擅行楷。或许，他们的相遇来自同为美国华侨的方人定兄长或亲友的介绍也未可知。

有关“春睡别院”出现和由府学东街迁出的时间，在目前可见的材料中没有谈及。我们目前所见高剑父最早以“春睡别院”署款的作品是成图于1926年的《绿杨城郭》。可以推论的是“春睡别院”迁离的时间当在1925年至1926年之间，而且“春睡画院”称谓的使用时间在1930年以后。如此的看法应不会离事实太远，至少高氏在1929年亲笔填写的“辛亥三二九生还义士调查表”住址栏中就注明居于“广州大东路廿七号春睡别院”。当时，“春睡别院”也为授画之处。由此看来，方人定最初的习画处应在府学东街。

由于方人定的国学功底很好，他除了能很好地应付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业外，还能快速地领受国画“六法”。1926年，毕业于广东法官学校高等研究部的方人定面临着生活与职业的选择，正如他所言“读律耶？学画耶？在徘徊歧路的当中”，最后他放弃了晋身仕途的机会，“益以受高先生之感化，研究法律政治之志向，更烟消云散，不久便将法律书籍尽送友人，或付一炬，以坚予志。”其实，



春江水暖 1926年 129 cm × 62 cm

作为读法律的高才生，方人定的兄长们都认为他最有从事司法工作的才华，希望其成为一位法官，绘画作为一个日常爱好是可以的，反对他放弃晋身仕途的机会，因为他们仍有“穷画家”的旧观念。

方人定初期以临习高剑父画作入门是无疑的，其成图于1926年的《池上鸳鸯图》题识云：“池上轩窗并水开，鉴湖狂客酒船回；鸂鶒鹢鹢知人意，也为春晖日日来。丙寅深秋，人定。”从题材可见其属于花鸟画的范畴。画作构图简洁，前景是生长于池塘上的红蓼，画家以水墨写出其干和舒展的叶子，同时以笔蘸上土红以细点的方式写出穗状的花，画幅再向前是以淡破浓的方式写出的湖石，两小一大，半工意方式写出的鸳鸯伫立其主石之上，雄性的脚独立，低头理羽，尾部旁边是以淡墨写出的高高的芦苇；雌性的在其身旁蹲下身子，闭目养神。水面上植物的红穗，与雄性鸳鸯颈部和羽翼上的红色相互辉映。整幅画用墨效果颇为淋漓，尽管在画雄性鸳鸯的胸部时用笔相对弱了一点，但造型准确，而且在表现鸳鸯足部时，颇显因熟悉结构而流露的自信，整画有一气呵成之感。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了活现池上的水，在石的底部，中锋、侧锋并用，以淡墨写出倒影。

同署“丙寅深秋”且题句相同的画作还有写鸭的《春江水暖》。此画绘池塘边的雌雄双鸭，雄鸭右脚直立，颈部伸长鸣叫，其双翼略耸；母鸭微蹲，翘尾侧身，引颈向左。学者认为此画甚为注意对造型的把握并着重表现水禽的体积感和瞬间动态。双鸭的勾染方法亦不同于传统的双钩填色，而是勾染结合，以突出双鸭的分量感。“颇似1920年前后高剑父带有日本画风格的作品。不同的是偏于精细秀润，不像高氏笔墨那么雄健粗放。”^[1]此固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此画有向高奇峰学习的痕迹。

高奇峰比方人定年长12岁，早期的绘画是属于居巢、居廉的“隔山派”风格的，

[1] 郎绍君、云雪梅：《中国名画家全集·方人定》，页6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907年游学日本之后，作品明显地糅合了中国画传统的笔墨形式和日本画法，在注重写生的同时又长于用色和水墨渲染。其实，高奇峰亦有与《春江水暖》相似的作品。从上海棋盘街审美书馆印行的明信片版本来看，两只鸭的造型，又或是题诗与方氏的一致，不同的是高氏之本母鸭后面仍有两鸭，上方只有芦苇，但方人定只取主体中的两鸭，同时将图由正改反，也在母鸭上方加上了野花，以及草丛上飘落的花瓣，后面菊花的表现方式，不得不令人想起1914年高剑父笔下《弱肉强食》中口衔野鸡的狐狸后面菊花的笔触。不同的是高氏用湖蓝写花瓣，方氏以白粉为之。画家把题诗置于雄鸭头部的上方。当时，高奇峰版的作品由于黑白印刷，缺乏必要的条件去考察其色彩，但整画的气氛仍是可以体味出的。而方氏的版本，颇能承接高氏形象生动、气氛轻盈活泼和极富时代感的特色。在色彩上，方氏敷色湿润，真实且诗意盎然。入门几年后能画出如此高质量的作品，其聪慧程度可见！

方人定早期的画在风格上是靠近高剑父的，至少在花鸟画方面如此，《春江水暖》的题字亦靠近高剑父早年的带有郑板桥气息的书风。方人定自1926年于广东法官学校高等研究部毕业以后，一直于春睡画院脱产学习，长达3年。春睡画院的日常运作及组成如何？

春睡画院的学生中大部分是日间有工作的，所以主要是利用星期日集结在一起，“早上七时以前，学生把上星期老师所拟的画题的作品带回来一一挂在墙上，七时老师在住房中出来，首先要求学生每幅画加以品评，每人都必须发言，然后由老师总结。其后一起饮早茶，然后到郊外或农村写生，其间一一指出某一风景或实物的可取之处，供学生参考但不要求学生一定画。”这表明春睡画院的个体中，“其内涵却近乎艺术实验室；它原则上由高剑父主持教务，但学生实际上

具有旁观博涉，作多种综合试验的自由。”^[1]作为老师，高剑父也参与写生，捕捉大自然的画材。午餐就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的路边茶寮的小食，活动大约在傍晚五六时结束。方人定的“春睡”生涯如何？高剑父曾云方人定“整日想的都是学画，写石膏呀！绘油画呀！画水彩呀！临画呀！写呀！写呀！什么都想学，抢时间学，没有时间考虑用钱，也没有时间去用钱”。^[2]

春睡画院是没有毕业概念的，或可以说是终身制的。同时，也不只限一星期上一次课，天天去也可以，郑淡然指出那里“从不授课，只是因材施教”。按弟子的个性与笔性进行。若笔性粗豪的，就导之入雄壮一派，笔底弱的则使其写秀逸一派。弟子中属于笔性钝滞的，就让其学习古拙一派，由于古拙中最易犯“肿死实”之病，所以高剑父就以秀韵之画，闲逸之书，悬挂于墙上，使弟子能时时观摩或临摹，以期调和而救济之，使古拙中带有灵秀之气。如果弟子的才情是有限的，就使之学“能品”一类。如腕力脆弱、写树石纤柔无笔墨的，则导之“积撞”一路，如“居派”的“撞水、撞粉”法。显然，这里所言的“课”，不可能与现在的美术学院的课程相比。高氏还强调学生的艺术要有个性，要使作品显示出各人自己的面貌，而且要注重写生。

2. “方黄之争”

青年时期的方人定最为广东画坛注目的是“方黄之争”。

1923年潘至中(1873—1929)、邓芬(1894—1964)、沈学巢、赵浩公(1881—1948)、卢振寰(1889—1979)、罗卓(1890—1954)、黄少梅(1886—1940)、姚粟若(1878—1939)

[1] 李伟铭：《高剑父、黎雄才艺术异同论——兼论近代日本画对岭南画派的影响》，载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研究室编《岭南画派研究》第二辑，页21，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

[2] 叶绿野：《令人敬佩值得学习的方人定老师——方人定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载梁江主编《方人定纪念文集》，页293，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